

音乐中的历史:从民歌看民国时期 甘宁青地区妇女的婚姻生活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甘宁青地区是民歌的海洋,民歌中蕴含着众多的历史民情。近代以降,甘宁青地区的广大女性仍然承受着“三从四德”的传统规训。诸如缠足、收领童养媳、守寡、老夫娶少妻等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不仅严重扭曲着妇女的生存轨迹,也影响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不过,随着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女性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她们已然开始追寻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争取个人权益。上述现象在甘宁青地区的民歌中有大量的反映,妇女不仅用歌声抒发自己的苦痛,控诉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并且用民歌倾吐自己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民歌这种以文证史的形式既能了解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女性婚姻生活的大致状况,又能体现这一时期破旧立新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民国;民歌;甘宁青地区;妇女婚姻生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7)01-0037-08

民歌是民间艺术宝库中的瑰丽奇葩,是世代的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发展起来的口头音乐艺术,是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和智慧结晶。甘宁青地区处于黄河上游,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产生于此的民歌瑰丽多姿,或荡气回肠,或雄浑凄婉,吐露着劳动人民发自内心的纯真情感,所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哈,不死了还这个唱法”,形象地道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民歌还是历史的见证,社会现象的缩影,民众日常生活样态的表征。挖掘这些民歌背后的历史价值和透析出的时代特征,是研究中国近代西北社会史一个可资尝试的路径。

一 待字闺中的少女生活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少女纯真稚气的真实写照,婚前少女活泼的天性未被严苛地压制,自由空间较大,这一点我们从民歌中可以得到证明。嘉峪关民歌《放风筝》^[1]中有这样的歌词:“正月十五习打灯,姊妹二人看龙灯,龙灯耍得凶。二月二来龙抬头,姐妹二人上彩楼,彩楼上飘打绣球。三月

里来三清明,姐妹二人上新坟,随带上放风筝”。固原民歌《放风筝》亦是如此:“三月里来呀是清明,姊妹二人来踩青,捎带上放风筝,哎哟捎带上放风筝”^[2]。从民歌简单的描述中可以知道,未婚女孩的生活有时候比较随意自在,欢乐如意。除此之外《十五玩花灯》《戏秋千》《姐儿浪街》《浪花园》等都是同题材的民歌。

然而,玩耍嬉戏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出嫁之前的“学习”关乎未来的人生走向。只有学会了绣花、家务,以及“三从四德”等规范,才能“去到婆家争纲常”。庄浪民歌《女贤良》^[3]中唱道:“我娘给我教针线,我嫂给我教茶饭。一学珍珠描衣袖,二学裁绞缝衣衫。三学人前多施礼,四学走路把头低。五学茶饭比酒香,六学磨坊李三娘。七学行善黄氏女,八学贤良数孟姜。九学寡妇高财女,十学刚肉奉母亲。把这些贤良学不会,你去到婆家受窝囊。把这些贤孝都学会,你去到婆家争纲常”。张家川民歌《你要为娘争纲常》^[4]中也有:“七岁八岁跟娘转,十二留头进绣房。一学巧手把花扎,二学剪裁缝衣裳。三学做饭锅上转,四学勤俭把家当”。显然,学这些事务的最

收稿日期:2016-07-10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近现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与基层社会控制研究(1840-1960)”(10CMZ025);
2015年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重大培育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SKZD15003)

作者简介:尚季芳(1976—),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终目的就是“去到婆家争纲常”，所谓的“争纲常”即为“争气”。对女孩子来说，文化知识的学习对她们来说可有可无，“争纲常”才是女孩在婆家赢得一席之地的最终目的，也是为娘家获得赞誉的重要筹码。

女孩学习女红之余，还要承受来自肉体的折磨——缠足，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套在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锁，甘宁青地区妇女的缠足之风普遍存在。高台民歌《裹脚》^[5]里唱道：“十七八的女儿家，好擦个胭脂好戴花，擦上些个脂粉呀，戴上两朵花，模样好像一个桃杏叶的花。初八十八二十八，乡里的丫头怕裹脚，听的裹脚往下摸，挨了两个脖（耳光），模样子好像一个茄子色。长长的裹脚头，缠下了一大堆，丁甲（指甲）挑下了半升多，脓血一盆多，模样子好像一个雨打梨花白”。另一首《缠脚歌》^[6]里，也满怀悲情地哭诉，“封建社会太可恶，女娃从小要缠脚。她大（父亲）追，她妈捉，她哥跟上拧耳朵。她嫂子上前缠裹脚，裹脚缠了一大罗。骨打肉烂受折磨，脓血能淌几马勺；剪子铰，刀子割，好似活鬼见阎罗。娃的爷，娃的婆，娃的嫂子娃的哥，哎哟哟，疼死我，娃的小命实难活；她妈听着嘴一咧，顺手打了两戳脖（耳光）”。正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缠足给妇女们造成了极大的肉体摧残和心灵创伤，然而在长辈的眼里，这是她的必修功课，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变态的审美观将女性推向了苦痛的深渊。

常言道：“家是避风的港湾”，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港湾里享受亲情的呵护与温暖。民国时期重男轻女依旧在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这一时期女孩被家人嫌弃，以被虐待为主题的民歌不在少数。例如民勤民歌《女出家》^[7]就很有代表性，“爹妈骂我不成才，哥嫂骂我嘴太弯，兄弟骂我人太孬，妹子骂我心不端，逼我出家院。辫子剃掉身上带，花花换成缙衣穿，绣鞋脱掉穿度鞋，头上戴了一道冠，走近尼姑院”。又如临洮民歌《小白菜》^[8]讲的则是女孩的生母死后，继母生了一个妹妹，结果“小妹吃的米花面，我吃的是粗茶饭。小妹穿的是绸花缎，我穿的是破烂衫。小妹要钱如流水，我要花钱你不给”。物质上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使得女孩极度渴望得到情感上的补偿，但事实却是“我想亲娘在梦中，亲娘想我一阵风”。

有些家庭还把女儿当作重要的劳力，例如高台民歌《花线鼓儿》^[9]唱道：“每天担水到黄昏，晚来推磨到天亮”。景泰民歌《李三娘推磨》^[10]中有“进去磨坊冷嗖嗖，命苦的个小妹把磨推”的歌词。民勤民歌《纺线》^[11]中也有女孩“嗡嗡嗡，嗡嗡嗡。一声接一声，半夜到五更，纺车永不停。两天纺一斤，一天是

半斤。嗡嗡嗡，一天是半斤，嗡嗡嗡”的辛苦劳作场面。甚至有些姑娘长到该出嫁的年龄，父母亲仍不准其结婚，致使女儿心生怨恨，“这么大的窗子这么大的门，这么大的姑娘不嫁人，娘老子坏了良心！唉哟，唉哟，娘老子坏了良心”^[12]。父母亲不给女儿许配人家主要是家中劳力太少，不得不延迟婚期，让其在家中分担父母亲的劳苦。

在婚嫁之前，女孩的生活有快乐烂漫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痛苦不堪的生活场景，一系列的社会规训牢牢地将她们捆绑，迫使其走向成人认可并接纳的范式之中，她们没法为自己活，只能为别人活。

二 婚姻生活中的喜与悲

20世纪前期，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女孩结婚意味着迈入无爱情基础的婚姻堡垒。女性的婚姻很难自己做主，所嫁非所愿者比比皆是。但也不乏男欢女爱、夫唱妇随的美满夫妻，且看固原民歌《摘棉花》^[13]，“你担上那个担担呀我抱上娃呀，咱夫妻二人要去摘棉花”，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再看银川民歌《走西口》^[14]，“正月里娶过奴，二月里走西口，提起你走那西口，两眼泪交流。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手拉上手儿呀，送出了大门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心担忧，情郎你把妹妹，常常要挂心头”。《出口外》^[15]唱道：“丈夫出口外，叫人泪下来，手提上小包袱，送出大门外。丈夫慢慢行，奴有话叮咛，手指着小包袱，内有几两银。棉衣包几件，新袜在里边，怕只怕路上，受呀受艰难”。同样主题的盐池民歌《磨炒面》^[16]唱道：“打上一碗鸡蛋暖上一壶酒，我送我的丈夫大路上走。鸡叫头遍磨房把灯点，我给我的丈夫磨炒面。黑驴推来麻驴驴换，磨了一升又磨半升。粗罗筛来细罗罗儿过，连天带夜来把炒面磨。做上一双鞋来包在包包里，我的丈夫穿上心呀心喜欢”。三首民歌都反映了妻子对即将离家远行的丈夫的依恋和嘱托，内中恩爱不言自明。而远在异地的丈夫也成为妻子时常的牵挂，“只绣襟襟不见人，哪有心思用心劲。摊开手巾往上看，不见我丈夫难绣襟襟。你在外边不回还，哪有闲心绣襟襟。绣花针儿拿线穿，不见丈夫泪涟涟”^[17]。另一首《五更银灯》^[18]唱道：“一更子里来哎鼓打一点，想起了我男人难上难，你在那门外哎做了买卖，忘记了回家看妻来。二更子里来月儿出了东，奴在绣房绣花领，手拿上针儿拨灯，想起了男人害心疼。三更子里来哎月儿高照，奴在高楼上睡一觉，梦见我男人回来了，愣愣的帽子长兰袍。四更子里来哎月儿高照，想起了男人长分离，忽听门外

有风响,定是男人转回乡。五更子里来咬金鸡叫,云退月落天亮了,养女的人儿凭良心,再不要给那出门人”。还有丈夫思念死去的妻子,“正月十五锣鼓子响,思想起我贤妻好不心焦,前几年我的那个贤妻在,今年过的年独自一人,哎!娃娃儿的娘啊!二月里来草芽青,贤妻给我留下两颗苗,领了娃娃没人做饭去,丢下我个光棍独自一人,哎!娃娃的娘啊!”^[19]两首民歌虽然都含有痛苦相思的情调,但其中隐含的满满都是对夫妻之间幸福美好往昔生活的怀念。

与此同时,妇女承担的繁重劳动和不公正待遇亦随之而来。首先,婚后的女性开始承担过量的家务劳动。武山民歌《锄棉花》^[20]唱道:“缸里无水要奴家担,灶火里无柴要我奴家揽(抱)。八十岁的老人要奴家管,三岁的憨娃娃要我奴家引(看管)”。西吉民歌《女孩担水》^[21]哭诉道:“东方发白城门开,城门开,十八岁的姐儿担水来,十八岁的姐儿担水来。早起担水四十担,四十担,夜晚磨面五更天,夜晚磨面五更天”。庆阳民歌《十八姐担水》^[22]中媳妇受到婆家虐待,出来担水时遇到自己的哥哥,这样哭诉:“自从来到婆婆家,一年的四季受折磨。他家没雇长工汉,里里外外要我管。灶火里无柴要我斫,缸里无水要我担。柏木水桶铁打圈,沙木的扁担压在肩。公婆家法真唠叨,女婿把我看着不着。公公要吃韭叶面,婆婆要吃烙油馍。女婿要喝姜拌汤,妹子就要我绣荷包。一件活儿干不好,连打带骂踢几脚。回去你对爹妈说,就说妹妹我实难活。爹妈只图财礼多,为嘴的媒婆贪吃喝。女儿今天不想活,看他们管我不管我”。听着妹妹的哭诉,哥哥捶胸顿足,但也无能为力,毕竟“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也是他谨遵的古训。

其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男孩成了妇女婚后的重要课程,若非如此,则流言蜚语、拳打脚踢一齐袭来。文县民歌《乡里大嫂来朝四月八》^[23]中写到:“自从小女子给给他家,两三个年头没有个啥(没有怀孕),公公也不喜,婆婆也打骂,受了男子汉多少话”。由此一来,如高台民歌《糟公婆》^[24]所唱“公公骂的吃得多,婆婆骂的指不着。大伯子过来就是一个膀,小叔子过来就一脚。嫂子过来扣给一碗饭,小姑子过来又拧又掐我。白日里吃的残剩饭,到晚上趴在灰堆上”。最终有的妇女被休,如金塔民歌《王员外休妻》^[25]中有“嫁他家十几年没生一个,王员外写休书赶出院落”。当时妇女若被夫家所休,便会被周围的人冠上一系列“罪名”。面对这种情况,她们往往选择自杀或出家。

再次,民国初期甘宁青地区处在蒋马政权的统

治之下,抓丁拉夫的现象所在多有,有些男人从这一去不复返,战死沙场;或者为了躲债,背井离乡,流落异地当长工,常年在外聊以度日,致使妇女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青海民歌《尕妹妹守了个空房》^[26]唱道:“西宁城墙四四方,乐家湾练兵的地方;把阿哥逼到前线上,尕妹妹守了个空房”。《民国时代不好了》^[27]亦是如此,“拔兵的马师长到了;年青的哥哥拔走了,我成了活寡妇了”。显然,这是对“青马”军阀大肆征兵最好的明证。甘肃辖区内的民歌中以控诉征兵的主题也很多,高台民歌《五更月牙》^[28]中讲述的则是妇女夜晚想念自己的丈夫,唱道:“丈夫年纪轻,马匪抓了兵,自从这走后到如今,整整三年没有音讯,咱家生活靠何人”。这些民歌清晰地反映了底层普通民众所受的苦难,同时借题发挥,用暗喻、反衬等手法揭示事实的本质,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愤恨。

最后,在传统社会,寡妇改嫁被视为不守妇道的表现,而守寡守节则被社会所弘扬,因此妇女守寡终身,忍受非人折磨的例子比比皆是。山丹民歌《寡妇务农》^[29]就这样讲:“奴家有心改嫁,儿女娃娃都小,奴家有心不嫁,娃娃几时长大。隄里儿的隄外,都得奴家陪伴。又要经营羊羔,还得给畜生添草。纺棉儿的织布,推碾儿的上磨,都是奴家全干,奴家的肝肠勒断”。在生活的重压下,她便发出如此的感叹,“守节难守节难,寡妇守节四十年”,最后的结果则是“寡妇牌坊立起来,人人都夸她有心肠”。民勤民歌《十三上订亲》^[30]唱道:“十三上订亲十四上迎,十五上守寡直到如今。紫花子汗褂身上穿,一个人活实在太难。单头子手巾头上裹,寡妇活人受折磨”。高台民歌《小寡妇上坟》^[31]更让人心酸:“打罢的春来过罢年,小寡妇上坟三月三……哭一声丈夫你来听,八十岁的老母谁照应,八十亩庄稼谁来种,骡马成群谁照应。雇上个年老的不中用,雇上个年轻的人耻笑。一哭哭了个羊上圈,咋没一人把我劝”。这个殷实的家庭因为丈夫的死而中落,妇女独自承担着家庭的重担,雇佣长工还怕招来异样的目光。除此之外,反映寡妇生活的民歌还有很多,例如《小寡妇做梦》《寡妇开田》《女儿守寡》《女寡妇》等等。

三 畸形婚姻中的妇女生活扫描

传统社会由于封建礼教的桎梏及种种社会陋俗,造成了很多不正常的婚姻。第一,早婚。宁夏民歌《小金莲》^[32]唱道:“一岁岁小三岁岁大,头到五岁没爹妈,小金莲没爹妈。五岁岁小七岁岁大,头到九岁脚裹下,小金莲脚裹下。九岁岁小十岁岁大,头到

十三岁到婆家,小金莲到婆家。公婆婆叨女婿娃小,背过身子眼泪掉,小金莲眼泪掉。没心吃,没心喝,满肚子苦水对谁说,小金莲对谁说”。这首民歌将小金莲的苦楚描述得淋漓尽致,五岁死了父母,十三岁出嫁,到了婆婆家遭到非人的待遇。

第二,童养媳。民乐民歌《太子装新》^[33]中讲“女十七来男八岁,十七八岁配成一双……看了公公十七八,看了个婆婆疙蛋大,看了女婿子杂娃娃,拿不动宝斗上不来炕……鼓打四更四更天,睡到炕上尿了一泡尿……头一个巴掌打得叫姐姐,第二个巴掌打得叫亲娘,我也不是你姐我也不是你的娘,妻子打你只是因你尿了一泡尿”。像这样小男人大媳妇的婚姻事例还有很多,正宁县的《哭嫁歌》^[34]哭诉道:“红颜女,命不强,要和碎娃(小孩)拜花堂。上苍错点鸳鸯谱,十八女子七岁郎。嘴上鼻吊涎水淌,晚上睡觉还尿床,等到女婿二十后,少女青春早枯黄。啊哈哈,我的大,啊哈哈,我的妈!”长期压抑的生活,让这些可怜的女性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便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童养媳》^[35]里唱道:“三月里,菜花黄,爹娘卖奴没商量。毛草柴,麦莠水,一口两口吹不着。公公过来踢一脚,婆婆过来拧耳朵。公公打,婆婆骂,女婿回来鞭杆砸,我童养媳活在世上图个啥”。童养媳之所以能风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女性地位的低下,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具体表现。由于家庭贫困,父母为减轻家庭负担,把女儿从小卖给别人家做童养媳,说是媳妇,其实就是女奴,只不过这个女奴未来的任务是给这个家庭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无论父母是出于无奈,还是心甘情愿,作为被嫁的女儿,心里多少都是有些怨愤的。比如有首民歌,“娘连老子人不像,为还青禾三升账,把我逼到干山上,黑风刮的黄沙扬,苦者就像牛一样,吃不饱的穿不上,男人还是斜脊梁,三天两头挨棍棒,只有我把河跳上”。有些妇女直接将怨恨发泄在媒人的身上,如“十七岁的姐儿八岁的郎,十七八岁配成了双。公婆坏来女婿小,背过身子眼泪儿掉。不怨爹来不怨娘,只怨媒人坏了天良”^[36]。无论是父母亲、媒人,还是童养媳本身,这些现象都是大时代下所折射的小人物的命运,是旧婚姻制度酿成的苦果。

第三,除此之外,老夫少妻的现象也举不胜举。靖远民歌《奴家和他有缘头》^[37]中的女子原本喜欢上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可最终结果却是“咱的个男人是老汉,又咳嗽来又吐痰,怎叫奴家心能安”。玉门民歌《盼情郎》^[38]中女子在出嫁前对自己的丈夫有美好的憧憬,可是“偷眼观望奴的夫郎,头发儿发白胡须长”,女孩子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高台民歌

《方四姐》^[39]中的方四姐本是个漂亮、心巧手又勤的女子,可是“黄河北有个于大人,十七岁上来投亲。十七岁姑娘嫁老汉,方四姐从此进火炕”。石嘴山民歌《小小灯》^[40]唱道:“小小的灯儿赛月明,低头进了那个绣房哎哟门,瞧见我那老丈夫思想起我本身,许了一个老头公,哎哟我那好伤心”。庆阳民歌《大夫小妻》^[41]更为形象生动,以老夫自嘲的口吻唱道:“年老的娶个少年的妻,好比那老鸡搂小鸡。有心大于拖一把,恐怕人问是女还是妻,臊了我的皮”。而一首《我大我妈爱银子》^[42],将始作俑者指向了父母亲,“我大我妈爱银子,把我卖给老头子;老头子,有胡子,气得我睡觉蒙被子。老头子给我吃李子,就给金子没意思”。在强权的压制和拮据生活的逼迫下,为人父母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送进这种婚姻的牢笼。

第四,抑有进者,因着包办婚姻,有些女孩所嫁的丈夫心智不正常,动辄对其武力相向。在民歌中也所在多有,例如正宁民歌《瞎瞎婚姻害处大》^[43]中唱道:“先上炕,揭盖头,捎眼就把女婿瞅。黄表脸,猴娃像,才知上了媒人当。女婿走路高天望,能执色子打麻将。秃痂头,脸又黑,脸上麻子有几百。进他家,没一年,受的折磨说不完,熬浓茶,把饭端,一时不对耳光扇”。西吉民歌《小金莲》^[44]与此类似:“炕上坐的女婿娃,头又秃来脸又麻,小金莲呀脸又麻。脖子上害的个鹰爪了爪,背上还有个驼疙瘩,小金莲呀驼疙瘩”。遇此,女孩又将气愤撒在媒人身上,《骂媒人》^[45]唱道:“贼媒人,瞎心肠,你把我害得好恹惶(痛苦)。巧嘴两头来说谎,黑白颠倒图日饷(吃)。你说婆家好过当,怎么穷得丁当响。你说女婿多漂亮,癞子满头武大郎。你说公婆真贤良,怎么成了白眼狼。他(她)把媳妇不当人,三天打来两天操。都怪你说得天花转,把鲜花插在牛粪土。思前想后好后悔,这一辈子咋下场?”但媒人并不认为他(她)们的行为有错,在《媒人诉苦》^[46]中媒人反过来申诉道:“说媒的,心肠善,都为成全好姻缘。男家女家来回窜,嘴皮磨破鞋跑烂。吃了几个炒鸡蛋,就被事主牵着转。老婆骂我不顾家,娃娃怨我多管闲。亲事说成是姻缘,谁把媒人记心间。说日塌(不成功)了人埋怨,又蹲尻子(屁股)又伤脸。两口子不合不怨命,反怪媒人嘴太馋。媒人的苦处没处说,还是少把这活揽”。媒人的自诉不无道理,让人心生怜悯之情。

做童养媳、嫁给老夫和智障丈夫,这种搭配拆散了太多的痴男怨女,这样的婚姻最终导致的结果往往有以下几种。第一,女子甘心忍受,在痛苦和无奈中度过自己的一生。民歌有言:“前世修行差几

天,没有修成共枕眠,这世有缘没份添,睡梦留下后世圆”。第二,强烈地反抗,但只能以香消玉殒而结局。第三,红杏出墙,幽会情郎。民歌中也可窥见几许,“樵楼上打一更,明月照窗棂,梅香一声唤,掌起那玉明灯,迈开金莲把郎引进绣房中,一步一点红”^[47]。“鸡娃娃叫来大天明,叫一声哥哥快起身。叫一声哥哥慢慢走,小心背后偷咬狗。咬破了衣裳妹妹缝,咬破了肉肉疼妹心”^[48]。“一更里来一支香,情哥哥来到房檐上,亲娘问我这什么响,太呀平年,亲哥踏的那个瓦儿响,年太平”^[49]。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东窗事发,往往以悲剧收场。甘肃省临夏县著名的《马五哥与尕豆妹》就是典型例证,尕豆是童养媳,与同村英俊潇洒的马五相爱,多次约会,沉浸在幸福之中,最终被婆家发现告知官府,终被捉拿,斩首于兰州华林山上。

四 妇女婚姻生活的近代化表征

民国是中国传统社会大裂变时期,近代化的因子越来越多地注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底层妇女的生存状态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她们身上的近代化表征渐趋明显。此种特点首先反映在妇女自身的觉醒上,如西和民歌《尼姑下山》^[50]唱道,尼姑“来到了山门前,刚有个俊俏郎,他把奴的魂勾散”,故她说:“怨了声爹和妈,为什么奴没寻个婆婆家,为的个啥缘故,教奴出了家……来到佛面前,双膝跪地台,我是个女人家,再不可把佛法犯,保佑我下山去,找一个男子汉”。尼姑思凡被认为是一种叛逆,但这种真性情的吐露无疑是值得赞扬的。另外,这时候还有表现女子盼嫁情绪的民歌,如高台县的《姑娘出嫁》^[51]，“十七八的姑娘大门上站,公鸡要踩母鸡的蛋,两眼泪不干……没吃没喝全不怕,针线活不会自学它,却无个婆婆家……长工短工都一样,看上个谁就跟谁,女儿我不怨娘,铺上些破毡盖上些皮,怀里搂上个尕女婿,心里是高兴的”。十七八岁的女子还未嫁人,在时人的眼里就已是大龄女了,因此迁怒父母。要尽快将自己出嫁,且不管贫富,只管爱情。另外一首民歌也体现了女孩子将爱情放在首位的婚嫁观,“女娃子本姓崔,年长十八岁,张妈妈来说媒,我和她反了嘴。不图那银和钱,不图吃和穿,单图那个劳动好,青春美少年。女娃子十七八,自己找婆家,单找那个劳动好,干活人人夸”^[52]。为了冲破封建藩篱、挣脱精神镣铐,少数青年男女已然冒着“伤风败俗”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追求美满婚姻与纯真爱情。比如《三月百草生》^[53]讲述的就是一对情人在家人的反对下毅然出走,“哥哥

走在前,小妹子随后跟,双双两个人逃出了后院门”。还有抗争离婚的例子,如庆阳民歌《大夫小妻》^[54]中丈夫对妻子以疑问的口吻唱道:“年老娶个少年的妻,好比那空中坐飞机,有心大街拉一把,恐怕我妻待理不待理,我有个老主意。白天吃的大米饭,黑夜里铺的二五毡,大家主事全靠我,第二早晨不呀不做饭,还得我老头干。又有房来又有地,为什么和我把婚离,你要和我把婚离,你把意见提呀提出来,咱二人把婚离”。从上述民歌中,我们能够体察到这一时期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对婚姻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当然,妇女的觉醒离不开时代的洗礼,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先后在诸马军阀、西北军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出现了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的新态势。在倡导妇女解放方面,诸如在禁绝妇女缠足,废除童养媳和老夫少妻等方面颇为着力。1927年,甘肃省成立甘肃省放足处,令民政厅长兼任放足处处长。先由杨慕时担任放足处处长,后为刘郁芬兼任。放足处直隶于省政府,内设处长、副处长,并分一、二、三科。各县又分设放足分处,由县长兼任处长。同年9月公布《甘肃省放足办法大纲》,规定“未及十岁之女子绝对禁止缠足,十岁以上未及三十岁之妇女一律迫令解放,三十岁至五十岁之妇人一律迫令除去木质鞋底”,同时限次年(1928年)5月份办竣,若还有上述现象存在,则进行罚办。“罚办分为三次,第一次科以五角至一元之罚金,并拘留其家长五日至十日,街长、村长同罚;第二次科以一元至三元之罚金,拘留家长二十至四十日,街长、村长同罚;第三次科以三元至五元罚金,拘留家长一月至两月,街长、村长同罚。予以罚款,并拘留其家长,街长和村正”^[55]。这个条例可以说是民国乃至近代以来甘肃省在禁止妇女缠足方面第一部详细的法规,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为了使百姓进一步明确放足的意义,政府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放足歌曲,进行宣传,如成县的《放足歌》^[56]:“天足妇女,利益无疆,做事方便,举止安祥。女界同胞,快快改良,力求解放。图自强,花女木兰,替父赴沙场,不惮险阻,百代永留芬。劝我姊妹,也学此榜样,赶快醒悟,女权日益彰”。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把放足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要举措之一,成效显著。1935年,甘肃省新生活运动委员会颁布了《本省力行剪发放足运动办法》,对于妇女放足工作做了明确规定。1940年3月15日,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签署省政府令,公布了《甘肃省各县查禁妇女缠足办法》,要求“各县查禁妇女缠足,分列四期(宣

传期、劝导期、解放期、强制期)进行,每期时间定为三个月”,处罚力度较前加大,成效甚彰。

同时,甘宁青地区还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通道和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作为其工作的重要一环,民歌有证。正宁县《缠足歌》^[57]就是一例,“八路军来了世事变,妇女都把小脚绽(放开)。假若不把小脚绽,敌人来了遭大难。敌人放枪擗炸弹,小脚跑路不方便。东一跑,西一窜,炸弹开花把命断。小脚地里去送饭,一条恶狼从后撵;往前跑,把跤绊,倒了米汤打了罐。打了罐,不上算,狼把喉咙都咬断;亲人气得把脚踹,都怪缠脚遭大难。大脚女人真灵干,能做活,能做饭,能砍柴,能挑担,能织布,能纺线。自卫军,游击战,又能操,又能练。遇见鬼子和坏蛋,挺胸昂头斗敌顽。剪头发,别卡子,圆口鞋,洋袜子;又时兴,又文明,走起路来脚不疼。大脚走路噔噔噔,小脚走路圪扭扭。两条道路摆得清,赶快绽脚莫放松”。这首歌运用简单明了、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了放足为妇女解放、发展生产、战胜敌军的重要一环。中国共产党对妇女的畸形婚姻亦坚决废除,努力革新。民歌《五哥拦羊》^[58]中女子的情人在地主的压迫下吃尽苦头,婚姻不能自主,“多亏了共产党,他把百姓来解放,自由婚姻我和五哥配成双”。另一首《女娃本姓崔》^[59]唱道:“女娃儿本姓崔,年长十六七岁,张妈妈来说媒,奴与她反了对。女娃儿年纪小,爹妈定婚早,三日吵两日闹,光景过不好。婚姻法规定好,年龄要长到,自个儿找女婿,别人就管不了。东庄上李二娃,年长整十八,再过上两年二十岁,我也满十八。今天有了空,出门去找他,要和他把话拉,再把婚订下”。崔姓女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完全能够掌控,边区婚姻法对其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与妇女控诉国民党和马家军阀抓兵拉夫不同,甘宁青地区思想得到解放的妇女则鼓励丈夫上前线打仗,报效人民。天水民歌《送夫参军》^[60]讲的就是妻子送丈夫参军的情形,临行前她叮嘱丈夫“你为咱穷人打江山,立功喜报送门前,全家都喜欢”,待凯旋之时,“为妻接你在村前,打垮了反动派,咱夫妻再团圆”。除了鼓动支持家人参加革命之外,妇女自身也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两当民歌《放哨歌》^[61]就是明证,“天明六点钟,太阳往上升,奴家去放哨,盘查行路人。大步往前行,来到路当中,东照照西望望,没见一个人。猛然抬头看,过来一伙人,扛机枪背步枪,走得好威风。同志慢慢行,你是哪部分,从哪里来到那里去,干的是何事情。叫声女同志,我是解放军,来陕西到四川,要打中央军。你是解放军,

我也不相信,把你的路证看分明,果然是解放军。打了中央军,个个都欢迎,穷人翻了身,忘了解放军”。女性能摆脱传统束缚,走出家门,参与革命,站岗放哨,进一步说明其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

五 一条研究路径:民歌的历史价值

在传统社会中妇女处于底层,属于弱势群体,她们的生存样态几乎被强权、金钱、“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社会规范所主导,她们过多的是服从、忍耐和被规训,很难有自己的话语权,满腔痛苦无处倾诉。然而民歌给了她们慰藉,在辛勤劳作之余,坐在田间地头歌唱自己的心声,控诉社会的不公,渴盼幸福的生活。应该说来自妇女的歌是发自内心的,是最具真实性的原始材料,最能反映女性的心灵世界。

当然,民歌中还有诸多反映甘宁青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重要材料,值得搜求探研。如民乐民歌《抓新兵》^[62]，“正月里来是新春,青海的马步芳来抓兵,有钱的娃娃拿钱买,没钱的娃娃抓了兵。二月里来春龙动,老汉的娃娃务庄农,拿不动锄来撒不动灰,世上的小伙子抓了兵。三月里来三清明,抓来的新兵罗家湾站,一天就给得半斤粮,肚子饿得心发慌。四月里到了四月八,抓上的新兵往汽车上拉,汽车坐上一股风,老娘子看不见落了空。五月里来到五端阳,抓下的新兵发衣裳,光发衣裳不发鞋,家里的鞋袜带得来。六月里来到了热难当,黄河沿上洗衣裳,光发胰子不发钞,衣衫烂了太可怜”。该民歌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马步芳在河西地区抓兵的真实情况,是了解马氏统治时期劫掠老百姓的难得史料。另一首民勤民歌《卖老婆》^[63]唱道:“民国十八年,口里(关内)遭年旱,饿得大张嘴,老婆当羊卖”。同主题的景泰民歌《逃难曲》^[64]唱道:“中华民国十七年,天下遭荒年,饿死了饥民几千哪,饿死了饥民几千。人吃人,狗吃狗,鹰雀老鸱吃石头,还不走有啥守头”。两首歌曲都反映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在甘宁青地区百年不遇的大旱,此次旱灾造成三百多万人死亡,有饿殍遍野,死亡枕藉之惨,为求生计,老百姓卖妻卖子和离村逃荒之事非常普遍。

民歌还是研究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民俗史的绝佳材料。民歌是记录民众生活、劳作、情感的最原始、最朴实的歌曲,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几乎涉及到了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农业生产、饮食居住、服饰礼仪、岁时节庆、习俗信仰、文化交流、民族交往、婚姻爱情等等。若将民歌中所涉及的上述材料逐一梳理,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

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加以探研,对推动西北地区社会史的研究不无裨益。以山丹县《种洋烟》^[65]为例,这首歌以时间顺序唱出了种罂粟的辛苦过程,“正月里来吧是新春,清朝家遗留下种洋烟。多种花儿少种了田,上去抽一口鸦片烟。二月里来吧龙抬头,庄稼人收拾了把田种。种上麦子盼秋田,早知道多种些鸦片烟。三月里来吧三清明,罂粟花地里绿荫荫。掐了头茬掐二茬,东西不大把人苦干。四月里来吧四月八,罂粟花地里把根扎下。根根扎来叶叶儿大,掐掉朵花还是花靠花。五月里来吧五端阳,罂粟花地里好满荡。忙把水浇粪壅上,一沟两行的好排场。六月里来吧热难挡,罂粟花地里配鸳鸯,白花儿开了红花儿喜,结上骨朵儿圆又圆,单怕骨朵儿长不大,官家的担子少不下。七月里来吧秋风凉,家家户户切口放,早上割开浆糊口,单害怕后日的雨嗖嗖。八月里来吧月儿圆,家家户户的浆口干,拔掉杆杆儿揪掉尖,打上些籽儿压了油。压油压油真压油,压上些麻渣喂老牛”。从二月到八月,从鸦片的种植到最后收割。犁地下种,锄草、浇水和施肥,整整忙活了半年,也担心了半年,怕花骨朵儿长不大,怕天气下雨,冲掉烟浆,最怕的还是官家的赋税交不上,真是“东西不大把人苦干”。如泣如诉的歌曲正印证了民国时期甘肃毒品泛滥的真切事实,因着政府和民众的双重困穷,政府征收所谓的“烟亩罚款”,民众为了缴纳罚款,不得不种植毒品。虽然解决了一时之需,但种植毒品挤占了良田面积,使农业减产,一遇水旱灾害,立致饿殍。进而斩断了社会生产的正常经济链,甘宁青地区近代化的步履维艰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相比于经过加工过的官方史料,民歌中有些片段还能弥补历史记载的纰漏。历史学家郭沫若说:“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66]。清末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统治阶级一律斥之为“回匪”、“回乱”等,极尽污蔑之能事。对起义领袖马化龙视为“逆首”。但在回族民歌《马化龙谣》中对其大加讴歌,“满清政府下毒手,调兵围攻金积堡……马化龙来一人挡,亲自出首到杀场,为保回民得安康,英雄大名天下扬”。这里面不乏民族感情色彩,但对正确全面辩证地评价马化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由于民歌属于文学,它的歌唱和写作手法往往带有夸张、想象的成分,抑或与实际事实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必须谨慎从

事。首先要甄别民歌的年代,考证辨明是属于时人所唱,还是属于后人加工;若属于后者,则其中的不确定性很大,往往带有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所处时代的烙印,应去伪存精。其次要运用文学与史学互证的方法,以文学补证历史的偏颇,以史学校正文学的虚构,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达到陈寅恪所说的“通识”能力。最后,民歌大多用方言唱出来,做研究时尽可能掌握当地的方言,并亲身做一些田野调查,了解此地的民情风俗,才能对所研究的对象有精准的把握。

总之,诚如历史学家陈寅恪主张的以诗文证史,他的《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借鉴陈氏的方法和理论,创造性地研究音乐与历史的关系,注重双方的相互比勘、会通融合,必定能有所收获。而甘宁青地区民歌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奇葩。挖掘这里的民歌艺术、民歌历史、民歌内涵,追寻音乐背后的历史事实,以民歌为节点透视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社情、民情当是非常有意义之事。

参考文献:

- [1]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254.
- [2]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49.
- [3]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陇东分卷:下[M].手抄本.1981:97.
- [4]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陇南分卷:下[M].手抄本.1981:417.
- [5]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159.
- [6]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M].2007:351.
- [7]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上[M].手抄本.1982:113.
- [8]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部分卷:上[M].手抄本.1983:71.
- [9]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377.
- [10]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223.
- [11]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198.
- [12]鲁剑.西北民歌与花儿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83.
- [13]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73.
- [14]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

- 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90.
- [15]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14.
- [16]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54.
- [17]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331.
- [18]刘文弋,张志学.庆歌俚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142.
- [19]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375.
- [20]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陇南分卷:下[M].手抄本.1981:604.
- [21]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52.
- [22]刘文弋,张志学.庆歌俚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169-170.
- [23]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陇南分卷:上[M].手抄本.1981:242.
- [24]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80.
- [25]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上[M].手抄本.1982:150.
- [26]达玉川.青海花儿选[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17.
- [27]达玉川.青海花儿选[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18.
- [28]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23.
- [29]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97.
- [30]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上[M].手抄本.1982:59.
- [31]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上[M].手抄本.1982:101.
- [32]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34.
- [33]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233.
- [34]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M].2007:350.
- [35]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M].2007:359.
- [36]徐荣坤.中国民歌精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72.
- [37]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中部分卷:上[M].手抄本.1983:107.
- [38]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293.
- [39]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228.
- [40]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30.
- [41]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陇东分卷:上[M].手抄本.1981:104.
- [42]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M].2007:310.
- [43]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M].2007:303-304.
- [44]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33.
- [45]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M].2007:310-311.
- [46]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M].2007:311.
- [47]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93.
- [48]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99.
- [49]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17.
- [50]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陇南分卷[M].手抄本.1981:359.
- [51]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227-228.
- [52]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宁夏民间歌曲资料[M].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136.
- [53]刘文弋,张志学.庆歌俚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57.
- [54]刘文弋,张志学.庆歌俚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165.
- [55]甘肃省人民政府公报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公报[N].1927-09-17.
- [56]李东轩.民国以来成县大事记(1912-1949)[M]//政协成县委员会.成县文史资料选辑.1994:176.
- [57]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M].2007:351-352.
- [58]刘文弋,张志学.庆歌俚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33.
- [59]刘文弋,张志学.庆歌俚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13.
- [60]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陇南分卷:下[M].手抄本.1981:466.
- [61]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陇南分卷:上[M].手抄本.1981:100.
- [62]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206.
- [63]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240.
- [64]甘肃省民族音乐集成编辑办公室.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河西分卷:下[M].手抄本.1982:290-291.
- [65]张掖地区文化局,张掖地区群艺馆.张掖民歌[M].油印本.1981:53-54.
- [66]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50-04-09(5).
- 【责任编辑 李冬梅】**